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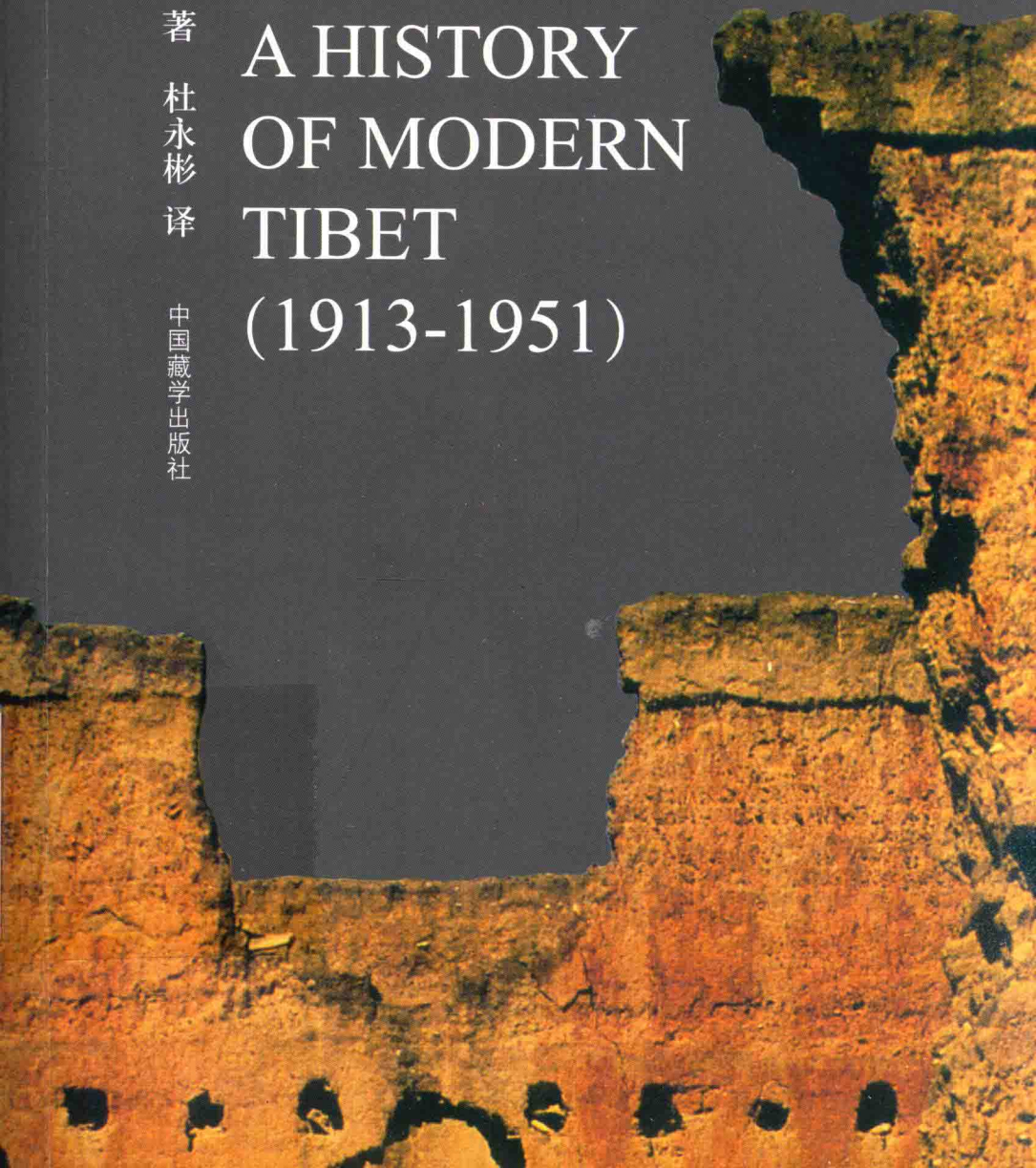
「美」梅·戈爾斯坦 著  
杜永彬 译

中国藏学出版社

# 喇嘛王国的覆灭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美] 梅·戈尔斯坦 著 杜永彬 译

# 喇嘛王国的覆灭

中国藏学出版社

## 谨以此书献给

我的生身父母，  
是他们给我提供了一切帮助；  
安德烈·罗巴诺夫—诺思托夫斯基教授(André Lobanov-Rostovsky)，  
是他第一个激起了我对历史和亚洲的兴趣；  
威利教授(Turrell V. Wylie)，  
是他使我产生了对西藏的语言、社会 and 历史的兴趣；  
索康·旺钦格勒噶伦，  
是他引导我阐明了错综复杂的西藏政治和历史；

以 及

安德烈(Andre)和德钦(Dechen)，  
这就使他们及与他们同时代的其他人能够更好地理解“喇嘛王国”覆灭的原因。

## 鸣 谢

自从4年前我开始撰写本书以来,美国、英国、印度、尼泊尔、加拿大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藏自治区的许多朋友都给予了我的研究工作以无私的帮助,这里不可能一一列举他们的姓名。然而,我要特别感谢的是,达兰萨拉的西藏文献和档案图书馆的降措次仁和扎西次仁,承蒙他们的好意,允许我利用他们本人所收藏的一些手稿和调查材料;贵族察绒和东波活佛为我与新德里的“西藏之家”建立联系提供了方便;伦敦印度事务部、伦敦公共档案部和华盛顿国家档案馆的工作人员为我大开绿灯;察绒札萨(四品官)、金·史密斯、黎吉生、格勒活佛以及印度事务部为我提供了重要历史人物的照片;洛桑·拉隆巴慷慨地让我引用他本人收藏的珍贵文献。黎吉生和艾普斯坦(Larry Epstein)还对该书的初稿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观点和建议,当然,他们对书中的错误和疏漏之处不承担丝毫责任。

我还要感谢“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颁赠给我的RO-2061—82号和RO-20886—85号两项资助,以及华盛顿国家博物馆研究所向我提供的第20805900号基金资助。正是有了这些基金资助,才使我能够获得所在大学所提供的研究时间,并得以广泛地走访原西藏政府及英国政府的官员。依照中国“国家高级学习与研究计划”(CSCPRC),我在拉萨从事辞典(即《现代藏英词典》。——译注)编撰工作的请求得到批准,这就为我收集有关西藏现代史最新学术论著和拜访原西藏重要官员提供了机会。该研究项目自始至终都得到了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的大力支持,多次准许我离校出国考察研究,并为我提供额外的资金。

并且,我荣幸地得到了许多经验丰富、谙熟业务的编辑、科研辅助人员和出版人员的帮助,他们是:赤来道吉、理查德·格文思、罗勒·古伯、龙·杰爱伦、卡拉·欧里思、彼德·罗帝斯、德纳·俄格和凯塞亚。此外,威廉·麦克伦及其手下的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的工作人员也给我提供了很好的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 汉文版前言

见到我撰写的《西藏现代史(1913—1951年)——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汉文版的出版是莫大的殊荣。向所有对亚洲史感兴趣的人们奉献一部详尽而论述公允的西藏现代史专著,是我写作本书的主要目的,得知中国的汉藏同仁现在将为我的研究提供方便,感到非常欣慰。在撰写本书时,我力图尽可能准确地引用有关文献和对我有用的材料,可是,倘若读者发现了新版本的错误之处,或提出修正建议,本人将欣然接受。

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西藏研究中心主任 梅·戈尔斯坦  
1993年8月27日于拉萨

## 汉译本序言

王尧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书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梅·戈尔斯坦 (M. Goldstein) 于 1991 年出版的《西藏现代史 (1913—1951 年)——喇嘛王国的覆灭》(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 Melvyn C. Goldstei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91)。

全书共 21 章, 照片插页 61 帧, 地图 11 幅。可谓皇皇巨著, 洋洋大观矣! 此书一出, 即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纽约书评》、《宗教研究评论》、《中国季刊》等美国评论性刊物都分别刊登了对该书的评论, 而迈克·胡特 (Michael Hutt) 的简短有力的评语, 可谓极而言之, 他说: “如果你一生中仅仅愿意读一本关于西藏的书, 那么, 你就读读戈尔斯坦的这本书吧!”

本书划定的年限是 1913—1951 年, 这正是风云变幻、海立山奔的年代。这期间, 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 (1914—1918 年和 1937—1945 年), 进步的、民主的、人民的力量和封建的、法西斯的、反人民的力量进行了世界规模的大厮杀、大搏斗。战后, 世界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有许多专著详为论述, 此处不赘。

单就咱们中国而言, 在此期间发生了惊天动地的辛亥革命, 推翻了维持两千多年的帝制系统的封建王朝, 随后又进行了长时期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反帝反封建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前仆后继, 流血牺牲, 规模之大, 时间之久, 都是空前的。最终导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我国人民经历了如此惨痛的历史, 全身布满伤痕, 难忘苦难的岁月和痛楚的悲歌, 痛定思痛, 其中最大的创伤莫过于帝国主义列强企图瓜分、蚕食我国的狂潮, 肆无忌惮、狼噬虎吞, 在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尤为猖獗的各种活动: 自白山黑水、蒙古大漠、新疆绿

洲、西藏高原、西南边陲，直至台湾宝岛，或则强行割占，或者制造事端，煽动分裂。那时，好端端的中国，无缘无故地成了帝国主义列强的盘中餐、俎上肉。所谓“西藏问题”就是那一时期炮制出来的“杰作”，人所共知，毋庸多谈。<sup>①</sup> 本书作者选择了查尔斯·贝尔（Charles Bell）爵士跟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合影作为封面，此时无声胜有声，恰恰如实地托出了这一时期在“西藏问题”上肇因和发展的一出出微妙戏剧的幕前幕后的导演，绝非偶然。然而，人民共和国终于在中国内地行使自己的主权，作为真正独立的国家，挣脱了列强加在自己头上的枷锁铁链，中国大地上再没有外国的租界，没有飘扬着外国国旗的军营，没有在中国街头横冲直撞的外国吉普车，没有停泊在中国内河和海港口岸的外国军舰……这就是中国人常引以为自豪的一句话：“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这对于某些外国洋人来说是十分不愉快而且无可奈何的事。以中国神圣领土西藏而言，再也不是由寇松勋爵（Sir G. N. Curzon）、荣赫鹏（Younghusband）上校、查尔斯·贝尔爵士和黎吉生（H. Richardson）先生等人密谋策划、指点江山、颐指气使说了算的时代了。这也就是使帕特逊（G. N. Patterson）、范普拉赫（Michael C. van Walt van Praag）、赫·哈雷（H. Harrer）之流怒不可遏地编造神话的根本原因<sup>②</sup>。似乎也就是我们跟西方

<sup>①</sup> 请参看杨公素：《所谓“西藏独立”活动的由来及剖析》，载《中国藏学》1989年第1期。

<sup>②</sup> 乔治·帕特逊（G. Patterson），*Tibet in Revolt*, 1960. *A Fool at Forty*, 1970. 范普拉赫（Michael C. van Walt van Praag），*The Status of Tibet: History, Rights, and Prospects in International Law*, 1989. 赫·哈雷（H. Harrer）曾以 *Seven Years in Tibet*（《旅藏七年》）一书博得浮名后，即以藏学家身份在西方招摇。

这三位作者的作品都可以说是发挥了高度想象力的作品，借用西藏问题来反华是这三位作者的共同理想。尤其是帕特逊和哈雷先生还在西藏和平解放前夕和解放后从事与学者身份极不相宜的活动，本书第二十一章有所记载，可供参考。另外，谭·戈伦夫在《关心亚洲学者集刊》1977年第9卷第1期上刊有一篇题为《世界屋脊》的评论，对帕特逊先生作了批评，可以参考。

某些人士老是说不到一块去的症结所在。<sup>①</sup>好了，现在梅·戈尔斯坦教授的《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出版了，读者可以放心了吧！作者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不会有中国血统的半点嫌疑，当然，他有美国人普遍意义上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他会以美国人的眼光来观察、分析、判断中国（包括西藏在内）的事。我们决不要拉外国人在价值取向上跟我们一致。看来，戈尔斯坦有志于此久矣。1968年，当他还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攻读时，就以《西藏政治体制的人类学研究》为题获得了博士学位（全书共255页，打印本）。那时，他就对西藏政治制度的腐朽性有所了解。后来越发不可收拾，1982年又发表了《拉萨的街头歌谣：西藏传统政治社会的讽刺文学》<sup>②</sup>，其尖酸泼辣、嬉笑诙谐，揭露西藏社会的黑暗丑恶，曾引发一批把西藏农奴制奉为神圣不可侵犯、并把西藏农奴社会说得如何如何美妙、如何如何幸福乐土的卫道士们勃然大怒，向戈尔斯坦头上倾盆大雨似地泼出污水浊泥。戈尔斯坦作为科学家，对自己的观点毫不隐瞒，也不忌讳。他在本书中结论性地指出：

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宗教是西藏政治中的一种和谐的力量，但是，它又是一种导致分裂和纷争的力量。各种宗教集团为了扩大自己的声势和影响，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和角逐，他们在有关宗教利益的政策上不能达成共识，从而给20世纪的西藏历史带来了灾难。

寺院集团拥护庄园农奴制的经济制度，并因此成为极端保守的势力。由于西藏力图适应20世纪日新月异的形势，所以，宗教和寺院就成为西藏社会进步的沉重桎梏。

这些话，毕竟是不容争辩的事实，是戈尔斯坦教授据长期追

<sup>①</sup> 请参阅杨公素：《评范普拉赫的〈西藏的地位〉》，载《中国藏学》1990年第2期；柳陞祺：《评范普拉赫先生的西藏史观及其他》，载《中国西藏》1991年春季号；张植荣：《对历史与国际法的严重歪曲——评范普拉赫的〈西藏的地位〉》，载《中国藏学》1990年第3期。

<sup>②</sup> 此文饶有趣味，中国的藏学界颇为关注，谢继胜将其译为汉文发表于《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一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踪调查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所得出的结论，得来并不容易。他，作为社会科学家，作为文化人类学家，曾经花了很大力气进行田野工作<sup>①</sup>，并且长期深入地学习藏语和藏文。为此，他还出版了《现代藏英词典》（1978年加德满都出版）和《现代藏语英藏词典》（1984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出版社出版）。以如此深厚的语言功底去发掘深层的史料，锲而不舍，孜孜兀兀，令人敬佩。我国近代史学泰斗陈寅恪先生曾说过：

一时的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sup>②</sup>

可以说，戈尔斯坦的大作是实践了这一准则的。他的书，绝对不是那种鹦鹉学舌、东拼西凑、抄袭他人、据为己有、盗名窃誉、欺蒙学界的骗子所能望其项背的。我们来看看他所发掘的材料吧。

最富于刺激性的莫过于英国和美国以及英国治下的印度政府的外交、政治档案了。这是戈尔斯坦教授的书中最为得意的部分，也是他花大力气得以公布这些档案，把上述政府对西藏问题的隐私公之于众，用以表明自己的写作态度是不偏不倚而中立、公正的。这些档案仅仅是全部资料中冰山的一角而已，就是这么一点点也确有其价值：

L. 韩德逊，是当时美国驻印度大使，代表美国国务院在印度呼风唤雨，八面串连，制造了一系列大事件，颇具戏剧性。今举出韩氏致达赖喇嘛的密信一封。1951年3月，在达赖喇嘛正打算从亚东返回拉萨、西藏即将和平解放之际，韩德逊眼看着中国共产党马上就要接管西藏而万分惊慌，秘密致函达赖喇嘛：

① 据作者自述，为了记录口碑资料，花了三年多时间，在西藏走访了79位西藏地方政府僧俗官员和事件见证人。

② 陈寅恪（1890—1969）：《金明馆丛稿初编》所录《陈垣〈敦煌劫余录〉序》。

外交部的一位高级官员最近访问了亚洲，他对西藏表示同情，并对至尊达赖喇嘛及其臣民的幸福深表关切，兹发去信函，内容如下：

一、北京的共产党政府决定获得对西藏的全面控制，达赖喇嘛对中共政府作出任何让步都不能改变这一决定。中国共产党宁愿采用计谋而不使用武力来控制西藏。因此，他们亟欲劝说达赖喇嘛达成一项将允许他们向拉萨派驻一名代表的协议。

二、北京的共产党当局向拉萨派驻代表，只会有利于中共加紧进行对西藏的全面控制。

三、在世界形势发生变化之前，中共将难以接管西藏，无论如何，达赖喇嘛不应当返回拉萨或者把自己和西藏的财物运回拉萨。（美国国务院删去了一部分）运回拉萨的任何财物最终都可能被中共接管。

四、在存在着中共可能会以武力或计谋夺取拉萨的危险之际，达赖喇嘛不应当返回拉萨。如果中共企图阻止达赖喇嘛出逃，他就应当离开亚东前往别的国家。

五、建议达赖喇嘛马上派代表去锡兰，设法同锡兰政府一道为达赖喇嘛的财产直接转运到锡兰作好安排。这些代表还应当设法获准为达赖喇嘛及其家属在锡兰寻找避居地，为达赖喇嘛离开西藏找到落脚点。在锡兰政府准许前来避难之后，达赖喇嘛应当请求印度政府作出担保，一旦他及其家人离开西藏，将为他们途经印度前往锡兰提供方便。

六、假如达赖喇嘛及其家族不能在锡兰找到安全的避难所，那么，他一定能够在其他任何一个友好国家，如西半球的美国等找到庇护所。

七、达赖喇嘛派遣一个使团前往美国可能也有益处，在那里，该使团将做好直接向联合国呼吁求援的准备。不用说，达赖喇嘛已经知道，由西藏派驻联合国使团的成员所提交的请求美国准予签证的申请，将会得到善意的考虑。

发自新德里（未署姓名及日期）

善良的人们，请读一读这封信吧，虽然历史的长河汹涌澎湃，已经过了四十多年，但是至今仍不失其新鲜的新闻价值。人

们难道不可以从中悟出美国山姆大叔为什么至今口口声声在叫嚷什么“西藏人权”的咒语么？后来，直到1959年3月拉萨的事件发生，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在印度土地上搞了个流亡政府，坚持反华、分裂祖国，难道不正是L. 韩德逊大使秉承美国政府的意图早已安排好了的么？

戈尔斯坦教授一书确实可以打开一些天真的、相信美国民主的人们的眼界。

至于印度政府、英国政府的外交档案也值得人们仔细阅读。

戈尔斯坦教授引用的资料中第二个与众不同之处在于相当重视口碑材料，尤其是能征引拉萨街头的政治讽刺歌谣入史，可谓别开生面，画龙点睛。当时的拉萨，没有报纸杂志，没有广播电台，没有新闻通讯社，没有任何可供人民群众发表言论和见解的手段，唯一可用的就是这一武器——口头歌谣。戈尔斯坦教授独具慧眼，广泛搜集，并作出恰当的诠释，使它能很好地反映人民大众对某一事件，出其不意地对某些人物的嘲讽和讥刺，十分传神，虽不成典故，确可算今典，请看下面两例：

ka shod da ru mgo la/	噶雪巴似两面鼓，
lha leam gtor mavi dkar rgyan/	[有一个]扁平脸的妻子，
mi byed dgu byed byas pa/	行为轻率而鲁莽，
mi srid srid pa byung song.	使不可能的事成为可能的事。
yod pas rgyu yis brgyab gis/	有钱人建房靠财力，
med pas dbang gis brgyab gis/	无钱者造屋靠权力，
ka shod bu lon pho brang/	[而]噶雪巴所建的一座特殊“宫殿”，
ma vdra vdra cig rgyag gis.	却靠的是他负债的能力。
me mdav dbyin ji kha thung/	英制来复枪，
chab mdo gzhung la bskyal nas/	被运送到了昌都战场。
tsha zhag vgrigs pavi lam rgyags/	(藏军的)食宿行都得到悉心照料，
slong gin slong gin log byung.	(而他们却)一路乞讨返回了西藏。

戈尔斯坦教授是美国人，受的是西方的传统教育，他对民族、国家、政治、文化心理都是以西方的观念来理解的，因此，其对西藏政治、文化的评议，必然有可商之处，其显著的地

方如：

对于热振活佛及其当政时期的政治措施的评价。作者本有机会接触过当时政界要人的回忆录及有关史料，可以作出自己的判断的，但可能是由于某种原因，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完全沿袭了英国那位黎吉生先生的观点，是非被颠倒了。在1979年第二届国际藏学会上，黎吉生先生撰文不过想掩盖他本人出谋划策、通过其代理人谋害了热振活佛的事实，从而歪曲了历史的真相。<sup>①</sup>非常遗憾，戈尔斯坦教授看不到事情的真相，而在一些非本质的问题上（如持戒不严谨等）兜圈子。

讨论西藏民族的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不可能脱离整个中国的大环境，不可能游离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的背景。戈尔斯坦教授恰恰在这方面有意回避，或者是不愿引起争论而有所疏失（据我所知，戈氏不谙汉语文，不无遗憾，因而送其公子多布杰到中国人民大学专攻汉语文，想弥补这一缺憾）。本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自己的传统和继承下来的精神财富，从而构成本国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基础。精神价值、智慧、思维方式和道德基础，千百年来仍然活在中国各民族人民的心中。民族之间存在着差异，这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丰富多彩的一面；但是还有其统一的民族共性，这是长期以来维系中华民族共同命运的另一面。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中华民众各族儿女血肉相连，生死与共，不正说明这一问题么？一小撮由帝国主义豢养、精心培育出来的分裂主义分子的活动，不过是中国历史长河中飘浮的泡沫而已。作家要联系传统与现实，看清整体与局部，分别主流与漩涡，最后弄清现象与本质的区别，也确实不是容易的事。戈尔斯坦教授作为人类学家，他十分注意民族间的差异性，但却不太注意民族的同一性，他未能把西藏历史放到苦难深重的中国近代史中去考察。因此，其某些解释和论断就难以令人信服。

在戈尔斯坦的书中有许多令人很感兴趣的篇章，有不少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论断。但是，令人惋惜的是他缺乏对中国历史

<sup>①</sup> 黎吉生 (H. E. Richardson): "The rva-sgreng Conspiracy of 1947" (《1947年热振的阴谋》), 载《藏学研究——第二届国际藏学研究会文集》第16—20页, 牛津1979年出版。

(尤其是中国近代史)的通盘了解。否则,他就不会仓促地写出那几句跋语,而会是另一种写法了。笔者愿意推荐读者们读一读另一位美国历史学家谭·戈伦夫(A. Tom Grunfeld)的一本书《现代西藏的诞生》(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汉译本),似乎可以看作本书的续篇。

本书汉译者杜永彬同志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以藏学研究获硕士学位。研讨藏学孜孜不倦,好学敏求,颇见功夫。他决定翻译梅·戈尔斯坦教授的大作,跟我商量过,而且下了不少功夫,历时一年有半,手不停披,笔不停书,查阅大量资料,反复核对藏文原文,并参考若干汉文记载,以求准确。我曾有机会与他共同研讨某些章节和问题,深深感到我国青年学者的努力探索精神,钦佩他能坚持不懈,奋力完成这七十万字的译事。

今,全书已经译竣,十分令人欣喜,乐为之序如上,以此就教于海内外同道及原书作者梅·戈尔斯坦先生。

1993年5月30日

写竣于北京寓庐

## 编者的话\*

M. C. 戈尔斯坦是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与藏学家。在西方藏学界，他独树一帜，自成一派，为国际藏学的发展作了巨大贡献。1986年以来，戈尔斯坦教授先后多次旅藏，深入牧区，实地考察，有一次到牧区生活研究，长达16个月，其辛苦及求实精神令人敬佩。在此基础上，戈尔斯坦教授先后发表一系列文著：《西藏西部的牧民》、《中国改革政策对西藏牧区的影响》、《中国在西藏自治区的生育控制政策》、《喇嘛王国的覆灭》。

这些研究成果推进了西方藏学的发展。特别是《西藏现代史（1913—1951年）——喇嘛王国的覆灭》，集西方藏学研究之大成，成为其藏学研究的代表作，也是西方研究西藏现代史的权威著作。

本书资料翔实，引证丰富。不仅使用大量的原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员回忆录及原始档案，而且使用英印政府、英国及美国政府的大量外交政治档案。后者的征引是目前西方有关西藏现代史研究著作中最为全面、完整与丰富的。另外，作者还相当重视口碑资料，大量征引拉萨街头的政治民谣入史，别开生面，文笔生动。本书的史料价值，正是我们组织翻译该书的初衷及目的。我国藏学研究已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是全球藏学研究的中心。我国学者对藏汉文字的藏学史料整理与研究均走在世界的前头。但是西藏现代史研究涉及大量外文资料。英印殖民政府，帝俄、日本军国政府以及美国政府都曾觊觎西藏。因此在这些国家官方外交政治档案中留存大量的关于“西藏问题”的原始档案。这些外文资料对于我国藏学研究无疑是一个良好的补充。囿于诸种客观原因，迄今中国藏学界尚未开展此项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实乃一项缺憾。在该书的行文中，作者花了大量篇幅征引史料，尽量多

---

\* 此为1994年时事出版社出版该书时编者所言。

引，保持原貌，并注明出处，一丝不苟。译者杜永彬，治史出身，获藏学硕士，汉、藏、英三种文字皆通，翻译过程中并得我国藏学专家王尧教授指点，翻译力求准确无误，以保持史料原貌。

我们希望该书的出版，不违初衷，能够为我国藏学研究提供更多、更权威的外文资料及其他史料，供我国学者研究西藏现代史参考。

正像其他西方学者一样，戈尔斯坦教授在前言中标榜自己持论中立客观，“既不倾向于达赖喇嘛的流亡政府，亦不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一边”。但是，由于作者受西方文化教育，其历史观、文化及心理观必然有与东方人的不同之处。他对西藏现代史的描述与评论肯定有与中国人的看法相左之处，甚至与历史原貌有不符之处。我们出版该书的目的并不表明我们与作者的观点相同。书中存在的诸多观点、立场的异见，深望读者明察。

1994年6月

## 汉译本 2005 年版代前言

——戈尔斯坦：美国的“西藏通”

杜永彬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美国人（包括学者、官员、民众和传媒）对中国西藏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他们对西藏的认识和对“西藏问题”的态度各有其特点。借《喇嘛王国的覆灭》再版之机，笔者首次对国际知名藏学家戈尔斯坦（Melvyn C. Goldstein）的“西藏情结”、“西藏观”和西藏研究“范式”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剖析，由此可见美国藏学的特点和美国藏学与其国家现实的关系之一斑。译者以这篇长文作为再版前言，意在帮助读者了解和认识戈尔斯坦其人其学其书，也可视为《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的导读。

### 一、戈尔斯坦与西藏的不解之缘

#### （一）学术历程与学术活动

梅·戈尔斯坦，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和藏学家，1938 年 2 月 8 日生于美国纽约市。1959 年获密歇根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1960 年，戈尔斯坦以《西藏的僧兵（rdab-rdob）研究》论文，获密歇根大学历史硕士学位。1968 年，戈尔斯坦以《西藏政治制度的人类学研究》论文，获华盛顿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随后他长期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的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任教和从事研究工作。作为一名职业学者，戈尔斯坦在 60 多年的生涯中，潜心于学术近 40 年，对西藏研究（藏学）情有独钟，取得了丰硕成果，并获得了不少殊荣。

1986 年至今，戈尔斯坦担任《跨文化老年学杂志》联合主编。1989 年，亚洲研究协会为其巨著《西藏现代史（1913—1951 年）——喇嘛王国的覆灭》（*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颁发“20 世纪中国最佳图书



奖——约瑟夫·列文森奖”荣誉奖（提名）。1991年，戈尔斯坦任“中美关系全国委员会”西藏事实调查代表团成员；国家科学院立项的“华北草原科学课题组”成员。1991年至今，任“喜马拉雅山两国自然保护项目”（尼泊尔和中国），“森林山地研究所”高级顾问委员会成员。1992—1993年，被授予建议评估课题组：IREX，蒙古项目的负责人，当选“人类学和人种科学国际联盟委员会”（IUAES）国际老龄化委员会委员。1997年至今，戈尔斯坦任“西藏扶贫基金会”理事；“中美关系全国委员会”委员。1998年至今，任《亚洲腹地》（Innre Asia）杂志编委。

## （二）与西藏的不解之缘

戈尔斯坦对西藏情有独钟，从1960年至今，其研究领域主要在藏族语言文字、社会历史、宗教、政治乃至人物等方面，他进行人类学实地考察的重点也始终在西藏。然而，戈尔斯坦与西藏结缘却是偶然的。他说：“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将自己的一生花在研究西藏上，并在（海拔）16000英尺的地方生活，这不是我所想要做的事。”戈尔斯坦最初的专业是语言，“同我一道在那里（华盛顿大学）工作的那位教授能够阅读藏文，但是不能说藏语，因为那里没有可以与之交谈的藏人。”“随后我不仅对文化感兴趣，而且对这个民族也感兴趣，所以我便从历史和语言转到人类学上来。”<sup>①</sup>

戈尔斯坦自1960年代中期起，就与其他学者合作，开始对域外藏区（印度和尼泊尔等国的藏族社区）进行实地考察和研究，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藏族的论著。戈尔斯坦娶索康·旺钦格勒的外甥女索康曲丹为妻，从此更与西藏结下不解之缘。索康曲丹1940年出生于拉萨的一个贵族家庭，后到印度的英文学校和美国的密苏里州的科特大学学习。曾任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东方和苏联研究所的中亚研究项目的语言顾问。可以说，索康曲丹是戈尔斯坦进入藏学殿堂的引路人之一，戈尔斯坦所取得的藏学研究成果，是与索康曲丹的全力协助和支持分不开的。

<sup>①</sup> Shari M. Sweeney, "The Real Tibet: A CWRU professor has spent a lifetime exploring the land and people that time forgot," *Sunday Magazine*, January 25, 1998.